

#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 文化符號辨析與《路得記》的互文性解讀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Mo, Zhengyi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6-29 13:31:08
Link to Item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80">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80</a>

# 文化符号辨析与《路得记》的互文性解读

莫 铮 宜

**内容提要:**本文从文学表现手法、宗教思想和历史传承三方面对《路得记》中的文化符号进行解析,表明其故事文本具有很强的互文性。那些文化符号在希伯来圣经的不同经卷中反复出现,在意义上相互关联、互为阐释、前后照应。因此对《路得记》的解读不应是孤立的,即不能脱离对希伯来圣经其他相关文本的研究。本文的研究还表明,希伯来圣经中文化符号的意义不是静止的,而具有动态延续的特性,不断受到历史变迁、异质文化融合及社会环境递嬗等元素的影响。

**关键词:**文化符号;互文性;《路得记》;希伯来圣经

## Cultural Symbols and the Intertextuality in the Book of Ruth

MO Zhengyi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ses the cultural symbols in the book of Ruth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namely, literary

representative methodology, religious belief, and historic transmission, to illustrate the intertextual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ory. These cultural symbols are constantly applied in different scriptures of the Hebrew Bible, which correlates, corresponds and explains one another in its meaning. Therefore, a successfu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ory of Ruth can be reached only when necessary study related to concerned scriptures is made. In addition,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re should not be a static view toward the meanings of the cultural symbols in the Hebrew Bible. Instead, it should demonstrate the dynamic continuation that is affected by the historic changes, mixture of diverse cultures and the variations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s.

**Key words:** cultural symbols; intertextuality; the Book of Ruth; the Hebrew Bible

## 一、互文性理论与希伯来圣经

互文性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发展的大潮中,由法国文学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首倡,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它们彼此牵连、相互作用,构成一个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文本组成的巨大的开放性文本系统和文学符号的演变过程。<sup>①</sup>任何文本都不可能脱离其他文本而存在,其意义都不会是封闭性或终极性的,因而必须反对单一的共时性研究,而要将文本放在历史和社会语境中进行研究。<sup>②</sup>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互文性理论进而主张重

---

①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载《现代西方美学史》,朱立元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947页。

② 王瑾:《互文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页。

视读者和批评家的作用,关注文本意义的动态重组关系。<sup>①</sup>

互文性理论对希伯来圣经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60年代,受“新批评派”影响的“圣经文学本体论”认为,圣经文本的自主性是决定其解读的关键,因而必须注重文本形式及其自身的阐释功能,而忽略其历时性或历史性意图。这种理论使人们得以从一个新的角度观察圣经。罗伯特·阿尔特(Robert Alter)证明,希伯来圣经是一个内在诸元素紧密联系的统一体,而非互不相干的拼凑物。<sup>②</sup>梅厄·斯腾博格(Meir Sternberg)在认同圣经具有整体统一性的同时,强调对它的研究必须重视其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性质,认为只有在全面了解希伯来圣经的宗教使命及其历史文化语境的基础上,才能做出负责的批评。<sup>③</sup>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也认为,圣经中的神话故事密切关联,具有系统性,代表了一个特定区域的文化范畴。<sup>④</sup>这些研究更关注圣经内部各文本之间的一体性和历史客观性,对其文化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本文拟以《路得记》为例,通过揭示并分析其中的文化符号来解析其互文性,考察它对其他正典经卷的继承与拓展;并解释互文性的成因,探讨文化符号在希伯来圣经中的作用和特征。

## 二、文化符号与《路得记》的互文性

希伯来圣经整体上具有明显的区域文化特征,这决定了构成

---

① 张智庭:《罗兰·巴爾特的互文性理论与实践》,《符号与传媒》2010年第1期,第40页。

② 罗伯特·阿尔特:《圣经叙事的艺术》,章智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7页。

③ M.Sternberg,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131-152.

④ N.Frye, *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the Literature*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37.

它的每一部经卷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很强的关联性。相互关联的内容会通过一些固定的文化传输形式在文本中反复出现,据此可称之为“文化符号”。<sup>①</sup>“文化符号”是希伯来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在圣经中通过一系列显性特征展示出来;由此,揭示那些符号便成为阐释文本的重要手段。从文学表现手法、宗教思想和历史传承三方面分析,可以发现《路得记》中的各种文化符号;进而看出该卷书的互文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它与希伯来圣经中的其他经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维持那种联系的正是文化符号本身。

### 1. 文学表现手法

《路得记》运用了多种象征手法,包括语义层面的名称象征和结构层面的场景象征。先看名称象征——

《路得记》中的人名和地名都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这种修辞手法是对律法书和先知书中寓意人名的直接继承,如“拿俄米”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甜蜜”或“愉悦”,“以利米勒”的含义是“耶和華是我的君王”。书中还提到“拉结”、“利亚”和“他玛”,这三个《创世记》中的女性均为犹太历史上的女性祖先,名字均象征着古犹太女子最重要的美德——传宗接代。在故事末尾路得之名与这三个名字相提并论,暗示一方面路得虽为摩押女子,其身份却已获得整个犹太民族的认可;另一方面,与其他伟大的犹太女性祖先一样,其德行也备受赞颂。

此外,人名的排列顺序也有一定的象征含义。路得是本故事的主人公,但其名字首次被提到时却位于俄珥巴后面,这种安排延续了律法书和先知书的表现手法:小儿子几乎总是得到神的恩宠而成为承传家业之人,如雅各、约瑟、以法莲、大卫等。<sup>②</sup>

① 周平:《文化符号的辨识与圣经互文解读》,《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第131页。

② 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3页。

除了人名,《路得记》中的故事发生在“士师时代的伯利恒”,这种时间和地点也有很强的象征意味。作者将饥荒与士师时代相联系,以利米勒全家离开伯利恒(意为“谷仓”)而投奔外邦,均暗示那时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严重问题,从而继承了《士师记》关于“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17:6;21:55)的批判性主题。

再看场景象征——书中的文化符号还通过场景的象征意义表现出来。第3章中的麦场相会就有着特殊涵义,路得趁着夜间潜入麦场,悄悄钻进波阿斯的被窝,主动扮演了求婚者角色,这使人自然联想起《创世记》中他玛为了给死去的丈夫传宗接代而假扮妓女勾引公公犹大的故事(38:6-26)。古犹太社会将女性生育子嗣视为最高美德,亦即家庭与社会的荣耀,故《创世记》将他玛的行为称为“义举”(38:26),超越了乱伦的概念。正是借助于这种特殊的伦理观念,读者才能理解端庄得体的路得为何在麦场上异乎寻常地积极主动——原来,如同犹太人尊敬的祖先他玛,她也在完成一项崇高的使命。

《路得记》第4章的“城门口交易”亦属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在那里波阿斯当着众长老的面,赎买了以利米勒家的田产,而在《创世记》23:1-20,亚伯拉罕也是在城门口与赫人以弗伦作交易,买了一块土地安葬妻子撒拉。在古犹太社会,重大交易或买卖通常是在城门口达成的,以便有人作证。在城门口,本故事中的无名氏当众脱鞋,示意要放弃赎买以利米勒家的地产,这种做法可以在《申命记》25:5-10中得到验证。

## 2. 宗教思想

在本篇故事中,路得对拿俄米忠心耿耿,离开自己先祖的土地,放弃原先的信仰,完全投靠以色列的神,跟随婆婆来到伯利恒(1:16-18)。这使人联想起《创世记》中亚伯拉罕凭着对神的信心和忠诚,离开故土往神所赐福的地方去。在《路得记》中波

阿斯称赞路得道：“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2:1）此语明显化用了《创世记》12:1 所载神对亚伯拉罕的话：“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sup>①</sup>希伯来原文用同一个动词 *lekh*（离开，出发）描述亚伯拉罕及路得离开故土而去异乡。<sup>②</sup>在《路得记》中神的恩典通过一个人物即波阿斯展现出来，波阿斯欣赏路得的忠诚和信心，处处保护她，主动安慰她，尽力帮助她。这与《创世记》所载神对亚伯拉罕的引领、保护与恩赐非常相似。而波阿斯最终娶路得为妻，在希伯来圣经中，婚姻和夫妻关系常用来比喻以色列人与神的亲密关系。由此可见，波阿斯对路得犹如神对亚伯拉罕。路得不仅为以色列人所完全接纳，而且最终成为其民族的女性祖先，地位可与男性族长亚伯拉罕相类比。所不同的是，她来自外族（全书先后 10 次提到其“摩押女子”身份），这与其后来成为大卫王曾祖母的身份形成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比。此间的神学涵义回到希伯来宗教的最初精神，即在与神建立圣约关系时，人乃是通过信仰而非单单依靠家族血统。这一点能从《路得记》最终被收入希伯来圣经正典得到证实。

### 3. 历史传承

《路得记》中的许多日常对话都隐含了文化符号，它们体现出对希伯来圣经文本的历史传承。如在第 1 章中拿俄米与两个儿媳对话，劝阻她们不必跟随自己回乡，说：“为什么要跟我去？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1:11-13）她何以如此言说？原来《申命记》第 25 章规定，如果以色列男子去世而无后代，其兄或弟有义务娶亡者的妻子，为其繁衍后代，使亡者不至于

① 罗伯特·阿尔特：《圣经叙事的艺术》，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2页。

② 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1页。

绝后；《民数记》第36章也规定，任何继承产业的女子必须嫁给同支族的人——这就是所谓摩西律法中的寡妇内嫁制度，意在保证以色列民族于战争、灾荒、瘟疫等社会和自然灾害的威胁下仍能繁衍不息。本篇故事中波阿斯与路得的结合是对寡妇内嫁制度的回应，因为波阿斯的祖先法勒斯是犹大与其儿媳他玛所生，而路得的祖先摩押人则是罗得与其大女儿所生，这两个祖先都是在寡妇内嫁制度中出生的后代。所以长老们为波阿斯和路得的婚姻作见证，并祝福他们道：“愿耶和華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4:12）

一如寡妇内嫁制度，赎买制度也具备典型的犹太文化特征，主要是为了维护以色列家庭的完整性和延续性。《利未记》第25章对于土地、房屋、奴隶等的赎买做出详细记载。《路得记》第4章体现了这一文化特征，波阿斯当着长老和众民的面发出郑重宣告，要履行其作为路得至亲者的赎买责任：

你们今日作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玛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玛伦的摩押女子路得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作见证。（4:11-12）

《路得记》结尾处对大卫家谱的陈述也是一个反映犹太历史传承的文化符号。该家谱从法勒斯到大卫刚好十代人，这与《创世记》的谱系排列极其相似：从亚当到挪亚是十代人（创10），从闪到亚伯拉罕也是十代人（创11:1-9）。如果说挪亚标志着大洪水过后新时期的开始，则亚伯拉罕就象征着以色列民族的起源，故此这两个被排在第十代的名字都是新时期开端的象征。而《路得记》用同样的方法将大卫排在家谱中的第十位，以便喻示另一个新时期——以色列王朝的兴起。据考证，从法勒斯到大卫事实上

不止十代人,其中一些人未被记载在家谱内。<sup>①</sup>足见大卫的家谱带有很强的历史象征意义,反映出《路得记》对《创世记》在形式上的刻意模仿。

### 三、《路得记》互文性表述的历史缘由

希伯来圣经由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卷三部分构成,《路得记》是圣卷中的一卷书,写于公元前4世纪左右的后流放时期。当时犹太教已然确立,律法书和先知书中的大部分都已成型,成为犹太社群中的权威性、规范性文本,被尊为最初的正典;它们是以色列民族信仰的依据,也是其解说世界与历史进程的出发点。

亡国与被俘之后,以色列人散居在各地,与西亚其他民族生活在一起,相互通婚;加之处于复杂的政治、文化、宗教处境中,逐渐形成多元化族群,即使后来不少人回归耶路撒冷,也仍与其他民族杂居在一起。这使犹太社群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多样性与丰富性。后流放时期以色列人面临着一系列共同问题,涉及犹太人的身份、作为神的选民的意义、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以以斯拉和尼希米为首的犹太主流社群主张在民族内部进行一场纯洁血统运动,要求以色列人割断与异族的婚姻,休掉异族女子。《路得记》则反映了另外一些犹太社群的观点与利益诉求,他们已与外族通婚且建立起家庭,主张民族融合与开放,认为以色列民族不单单以共同的血缘为基础,更重要的是以恪守神的盟约为前提。在当时主流社群的压制下,这种观点无疑是微弱的。《路得记》是整部圣经中对话成分最多的一卷书,在总共85节经文中,有55节是对话。由此可见,主流之外的边缘声音常常难以被文本

---

<sup>①</sup> Z. Ron, "The Genealogical List in the Book of Ruth: A Symbolic Approach", *Jewish Bible Quarterly* 2.38 (2010):90.

化,只能以口头形式在民间流传。其观点虽然微弱但又相当顽强,出于自身的需要,那些社群在继承最初正典的基础上,对其做出了能动性的解释,从而形成新的文本;那些文本逐渐获得认可,最终成为新的经典。所以《路得记》是律法书、先知书的基本范式与新生犹太社群之间互动的结果。<sup>①</sup>通过这种互动,一方面犹太教的重要观念得以延续,另一方面新的历史经验得以融入传统,构成以色列民族信仰中神人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四、小 结

《路得记》中的文化符号表明,其故事文本具有很强的互文性,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传承了希伯来圣经正典的特质。这种传承背后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特定犹太社群的利益诉求。因此,对《路得记》以及类似经卷的解读不应是孤立的,而应与圣经其他相关文本彼此结合。对《路得记》的研究表明,文化符号贯穿于整部希伯来圣经之中,以致各经卷的文本相互联系,相互阐释,前后呼应,使希伯来圣经成为一个内部诸要素紧密联系的统一体。

作者莫铮宜,宁波诺丁汉大学文学硕士,现为宁波教育学院高职教育学院英语讲师,从事圣经文学研究及翻译研究。近期发表论文《文化差异对英语成语汉译的影响及对策》等。

---

① 李炽昌,游斌:《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4页。